

芙蓉楼与万岁楼位置考

□ 朱思丞

《芙蓉楼送辛渐》是王昌龄被贬为江宁丞时所作。这首诗的一大特点是淡写离情别绪，着力点在展现作者开朗坚强的性格和高风亮节的品格，历来为人们所称道：

寒雨连江夜入吴，平明送客楚山孤。
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

芙蓉楼，一名千秋楼，据《元和郡县志》卷二十五江南道润州项载：“晋王恭为刺史，改创西南楼名万岁楼，西北楼名芙蓉楼。”王恭是晋孝武帝皇后之兄，太元十五年(390年)二月“镇京口”。芙蓉楼建于哪个位置，由于缺乏相关记载一直没有定论，一说建于古镇江城内的月华山上。其实，建在月华山上的不是芙蓉楼，而是“万岁楼”。因为月华山又名万岁山，下有万岁岭，万岁楼之名大概由此而来。由于两个楼距离较近、相互呼应，后人为了与“万岁”一词相对，亦称芙蓉楼为“千秋楼”，称万岁楼下桥为“千秋桥”。南朝宋刘损所作的《京口记》就提到：“晋王恭为刺史，改创西南楼，名万岁，西北名芙蓉楼，至今存焉。”刘损与王恭相距不足百年，这个记载是可信的。据史料记载，王恭在任期间对城垣曾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修葺，《舆地志》云：“(京口)今之城宇，多恭所制。”在唐朝赫赫有名的两座诗楼——万岁楼、芙蓉楼便是在此时修建。

万岁楼在唐代与芙蓉楼一度并峙齐名，孟浩然、李绅、皇甫冉等皆有诗，尤其是孟浩然《登万岁楼》中“天寒雁度堪垂泪，月落猿啼欲断肠”两句，以“人不如物”刻画思乡的愁思，可谓入木三分。王昌龄也写过一首《万岁楼》的诗：

江上巍巍万岁楼，不知经历几千秋。
年年见山长在，日日悲看水东流。
猿狄何曾离暮岭，鸱鸢空自泛寒洲。
谁堪登望云烟里，向晚茫茫发旅愁。

从这首诗可以看出，万岁楼在唐人眼中非常古老。但是后来万岁楼被蒙上一层神秘面纱。李绅《忆万岁楼望金山》题下称：“万岁楼，往年清夜浮于江中，有宿楼者觉之，重锁于城上。”《舆地



志》也记载万岁楼“飞向江外，以铁锁磨之方止，至唐犹存。”至于为何“以铁锁磨之”？据《太平广记》引《辨疑志》称，俗传润州万岁楼上常有烟而出，古人认为不吉祥，润州甚至一度被称为“凶阙”。好在唐肃宗乾元年间，万岁楼又有烟粗一尺多，直上几丈高。官府中有人壮着胆子去察看，结果发现是万岁楼下井中的蚊子之类的小虫子抱成一团向上飞，远看像烟一样，这才真相大白。

相比万岁楼的坎坷经历，芙蓉楼因王昌龄的《芙蓉楼送辛渐》声名鹊起，成为文人雅士登临题咏的名胜之地。《全唐诗》中谈及芙蓉楼的诗多达十首，崔嵬登上芙蓉楼看到的是“烟树临沙静，云帆出海稀”(《登润州芙蓉楼》)，丁仙芝在《和歌章·江南曲》写的是“始下芙蓉楼，言发琅琊岸”，可见芙蓉楼临江而建，靠近渡口，当然周边还较为繁华。宋代汪藻在《月观记》亦有芙蓉楼的

详细记载：

“州治之西有楼焉，并城而出名曰千秋者，考诸图志，始于晋王恭之时，由楼西南循城百步余，忽飞檐曲榭，卓然孤起于城隅之上，望数百里见之者月观也。”

参照这段记载以及唐诗中芙蓉楼的地理特征，笔者觉得芙蓉楼最有可能位于今天镇江烈士陵园所在高地。明末清初时诗人王宏祚在《舟中望金山寺》的诗中提到“芙蓉楼瞰银屏渡，萍蓼沙通铁瓮潮”，这首诗指出芙蓉楼靠近铁瓮城。按照古人的文化习惯，芙蓉楼不会建在铁瓮城外。铁瓮城在三国时相当于孙权的王城，明末时城墙尚有残存，如今烈士陵园北门西侧为铁瓮城遗址。陵园所在高地均在城内，这正好印证《元和郡县志》所载“西北楼名芙蓉楼”。陵园所在高地西南侧是万岁山，下有城隍庙，这里曾是镇江最为繁华的

地方。明代前，这块高地由北固山延伸而来，据说因刘伯温斩北固山龙脉，才导致其与北固山分离。唐时北固山三面环水，从地形判断，北固山东南方向通过这块高地连接凤凰岭接入陆地，高地的北面接着长江，所以芙蓉楼也是古人看日出的好地方。

为什么很多人认为芙蓉楼建在月华山呢？一方面，由于这两地连在一起，难以区分。月华山是明朝时才命名的，据《光绪丹徒县志》记载：

“月华山在府治西南，一名万岁山，其山由西向东，纵长五十三丈四尺有奇。中断，为府前鼓楼，故名鼓楼山。面向西南，顶宽六丈四尺有奇。高二丈，加下连凤凰岭，计高七丈七尺有奇。”

从这个记载看，月华山、凤凰岭与镇江烈士陵园所在高地连在一起。另一方面，镇江烈士陵园所在高地与北固山分离后一直没有名字，但是它比月华山高一些(晚清时月华山高25米有余)，所以，后人把它也叫作月华山。王昌龄选择在芙蓉楼送别辛渐，不仅是因为环境好，交通也便利。只需走下芙蓉楼，到铁瓮城边就可乘舟北上。从王宏祚的诗中可以看出，清初时铁瓮城上还有芙蓉楼，这个楼即便是后人复建的，根据古人的文化习惯也肯定是在原址复建，所以我们基本可以推断芙蓉楼就在镇江烈士陵园所在位置。如果这个推断成立，王昌龄诗中“平明送客楚山孤”的楚山，则最有可能的就是北固山了，而不是很多人认为的“金山”。因为受北固山遮挡，站在王昌龄送行的地方是无法看到金山的。诗词中有种手法叫“主客移位”，王昌龄写“楚山孤”实际上表达的是朋友走后自己内心的孤寂之情。此时，王昌龄站在北固山左侧的铁瓮城下，除了江水，只有辛渐和北固山在他的视野内，当辛渐乘舟慢慢远去，反衬出北固山的“孤”，由此诗人产生“楚山孤”的情感和心境，这是非常真实的状态。

爱植树的唐代诗人

□ 王婉若



当春风轻拂大唐的山川大地，诗人墨客们也纷纷投身于植树的行列，为这片古老的土地增添生机与诗意。在他们的笔下，植树不仅是一种劳作，更是一种情怀的寄托，一种对生活、对自然的热爱表达。

诗圣杜甫一生颠沛流离，却始终怀揣着对自然的深情。在成都浣花溪畔，他营建了自己的草堂。为打造一方清幽之地，杜甫亲力亲为，精心挑选各类树种。“草堂少花今欲栽，不问绿李与黄梅”，此句尽显他对植树的急切与期待。他满心期许这些树苗能在这片土地扎根生长，为草堂带来一片绿荫。此后，每日劳作之余，他常静坐树下，静静聆听树叶沙沙作响，感受自然气息。这些树木不仅为他提供宁静的创作环境，更是他情感的寄托。艰难岁月里，树木的茁壮成长给予他希望与力量，支撑他在困境中坚守内心宁静，保持对生活的热爱，让他在草堂的时光充满自然的诗意与慰藉。

王维，这位被誉为“诗佛”的诗人，其诗作满溢禅意与自然之美。他的辋川别业宛如人间仙境，而这仙境的营造离不开他对植树的热爱。“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。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。”王维笔下，松树成为高洁、宁静的象征。可以想象，他漫步于亲手栽种的松林间，听松涛阵阵，看月光透过枝叶洒下斑驳光影，心中满是对自然的敬畏与沉醉。他以植树为笔，构建起与尘世隔绝的精神家园。

李白，豪情满怀的诗仙，以笔为剑，在诗的江湖中纵横捭阖。“楼东一株桃，枝叶拂青烟。此树我所种，别来向三年。桃今与楼齐，我行尚未旋”，诗句中清晰地展现出他曾亲手种下桃树的经历。彼时，李白或许在东鲁的居所旁，满怀期待地播下桃树种，看着它们从破土的嫩芽，逐渐抽枝展叶，直至枝叶繁茂，能轻拂青烟。在他四处漂泊的日子里，那棵桃树承载着他对故乡、对家人的深深眷恋。即便他行迹天涯，心中也始终牵挂着这棵亲手栽种的桃树。除此之外，他在游历山川时，对自然中的树木同样满怀深情。“平林漠漠烟如织，寒山一带伤春碧”，他将广袤树林在暮霭中朦胧如烟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，展现出对自然植被的敏锐洞察与由衷喜爱。

白居易同样对植树情有独钟。他任杭州刺史时，积极倡导植树造林，为西湖增添了许多美景。“最爱湖东行不足，绿杨阴里白沙堤”，白沙堤上的杨柳，在他的倡导下，成为西湖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白居易不仅亲自参与植树，还以诗为媒，呼吁更多人爱护树木。他深知树木对于美化环境、改善民生的重要性。在他的努力下，西湖周边绿树成荫，不仅为百姓带来清凉与美景，更成为文人墨客吟诗作对的绝佳场所。他的植树之举，不仅造福当时民众，更在千年之后，依然让后人领略到西湖的独特魅力，其对西湖的绿化贡献，成为千古佳话。

大唐诗人借植树为大地添绿，他们在植树中，或爱自然，或寄生活期许，或筑精神家园，留下宝贵精神财富。

远去的皮匠

□ 孙建远

“皮匠一扎一个洞，只够吃穿不够用”，这句话中的“皮匠”是当地人的叫法，北方或者书面语又称之为“鞋匠”。镇江人非但喜欢叫皮匠，而且还要加个“老”字，叫“老皮匠”。

不知有啥讲究？但以我的阅历所见，皮匠确实是老的多，而且多为男性。印象中，他们在农贸市场的旁边，露天设摊，风吹雨打日晒，脸黑手粗，很辛苦。

我们小时候和皮匠倒是经常零距离接触。那时居民普遍经济条件差，很少买鞋，都是做鞋穿，所以生活中少不了皮匠。

每年入冬，母亲就要开始为我们准备过年穿的新鞋了。我家弟兄两个，连父母自己共四人，母亲一做就要四双。从糊硬衬开始，到剪鞋样、扎鞋底，历经多道工序。最费时费工夫的就是扎鞋底了，母亲那一段时间手里一有空就是拿起鞋底，用针往头发上一磨，使劲扎进鞋底里，然后便是“嗤啦、嗤啦”的过线声。一针又一针，考验着母亲的耐力和韧性。

鞋底扎好后还要去找皮匠，这钱是省不了的。上鞋是真功夫，母亲在这点是实事求是的。我们家的布鞋就找一位住在我外婆家隔壁的皮匠做，这皮匠姓陶，上了年纪了，长相也老些，在我们小孩眼里，他绝对是“老皮匠”了。他的脑袋较大，一年到头剃个光头，脸上又总是自然地浮着和蔼可亲的笑容。他喜欢孩子，我们去送鞋取鞋时，他常常会一面做活，一面和我们这些乳臭未干的小孩子闲聊。

老皮匠的手艺精湛，上出来的鞋子挺括，合脚，在我们那儿颇有口碑，生意特火，所以我看见过的他，一年四季总是坐在堂屋里的木凳上做鞋或补鞋，忙得从未看见他站起来过。

说起来皮匠的工具最简单了，不像木匠，有几十种各式各样的凿子、刨子；一把皮匠刀、一把锥子、一把锤子、一只“铁脚”，有这几件，皮匠就可以满世界跑了。

写到这里，想起一个笑话，说有个皮匠也想沾点文气，请位先生给自己的皮匠铺子起个名号。那先生想了想就给他鞋铺取名“甲乙堂”，鞋匠不解，又去请教一位秀才。秀才说，你鞋的锥子不就像个“甲”字吗？那“乙”字可像你的皮匠刀？这“甲乙”两字倒很像这两种工具的形象文字呢。

皮匠的基本功，一是使锥，一是用刀，还有一件是钉钉。以前手工做的鞋子，为了耐穿，必做得鞋底厚，上鞋时不易扎透，就须用锥子先在鞋底上扎个眼，然后两手使两根针引了线，鞋里鞋外同时对穿，勒紧；再将两根扎底底线根在嘴里，扎第二锥。皮匠刀不是直柄是曲柄，如“乙”字形，曾请教过皮匠师傅，说是这个造型用得出力。皮匠刀磨得很锋利，半寸厚的布鞋底毛边，一刀一刀贴紧鞋边切下，整只鞋切完后，光滑得如模子里脱出来的，整整齐齐。钉钉主要是补鞋底，以前为了止鞋底耐磨，常在鞋跟和前掌各钉上一块皮，常用橡胶车胎皮。用鞋钉钉住胶皮和布底，既要钉牢，又不能戳脚，就须算好厚度，用尺寸合适的钉，钉过去正好，再击平，务使不戳脚。这就是日积月累的功夫。鞋子要做得有形，须用锥头槌槌，槌一夜的时间下来，样子就挺拔了。

鞋匠多出摊，这姓陶的鞋匠却是设摊在家，生意照样好，可见那时手工做的土布鞋的市场有多大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多数人都买现成的鞋子穿，不再手工做鞋了，皮匠师傅们已逐渐消失，成为一个时代的印记。

追忆著名蚕学家高一陵

□ 王福海



左图：1978年高一陵(前排左2)和来访蚕研所的南大公司外国专家团合影
右图：1982年高一陵(右2)接待日本蚕学专家

高一陵，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原所长，正厅级离休干部。1919年4月出生于浙江杭州。1933年在南京贫民教养院初中毕业，不久被资助考入浙江省立高级蚕业职业学校，1936年7月毕业后留校任助教。

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，高一陵满怀抗日救国的热情，于1938年4月参加了浙江省义勇队，在浙江省委领导的外围组织——民族解放先锋队，并在浙江省委乌山任战时政治工作队长、干事、队长。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40年8月受党组织委派，参加了新四军皖南东南局党员培训班，结束后分配到新四军军部民运部，先后任工作组组长、新四军二支队三团政治处政工队长。

皖南事变中他突围到苏中根据地，1941年8月任苏中区委《抗战报》记者，苏中区委党校教育干事、支部书记。1942年12月至1943年3月在苏中区委任陈丕显同志秘书。1943年4月至新中国成立，在解放区任高邮县委、苏中二地委秘书、政策检查团副团长、区委书记、县委宣传部长、报社总编等。

新中国成立后至1952年8月，高一陵任苏北区委委副书记、秘书处副主任、秘书处处长、苏中区委委办公厅副主任。1952年9月至1957年8月，任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厅办公室主任、办公厅副主任、主任。

1957年8月，为了响应周恩来总理“向现代科学进军”的号召，高一陵奉命来到镇江，担任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副所长兼党组副书记，后任研究所所长兼党委副书记，直至1983年4月离休。

在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工作的

27年里，高一陵重视调查研究，注重了解国内外蚕业领域的科研与生产动态及发展趋势。由他牵头的“空头性软化病病原的研究”，否定了过去认为该病是生理失调的观点，在国际上首次试验证明空头性软化病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病毒，此项研究成果获江苏省科学大会奖。

1971年，江苏省省范围内桑树萎蔫病爆发，高一陵及时组织所内外技术人员协作攻关，提出了挖除病株为主的综合技术措施，较有效地控制了桑树萎蔫病的蔓延危害。

在指导家蚕品种选育工作中，他提出了“春用品种利用引进品种杂交改良”的理论。把“三高”(高产量、高质量、高工效)和“四化”(桑园管理机械化、小蚕共育专业化、大蚕饲养省力化、蚕茧品质优良化)作为科研方向，提出了加速实现蚕业现代化的报告，并亲自在农村主抓了百亩大桑园的建设。

在长期担任中国蚕学会专科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工作中，他依靠全国科研、教学和生产单位力量，结合实际，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蚕业学术活动，进行科学普及和科技咨询服务，同时创办了学术性期刊《蚕业科学》并担任主编，这一刊物作为发表与记录全国蚕业科研成果的载体，见证了我国不断发展的蚕业科学的学术成就，对提高我国蚕业科学研究水平具有重要的影响。

多年来，他先后任国家科委农业组成员、中国农业学会常务理事、中国蚕学会副理事长、中国蚕学会荣誉理事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第四、第五届委员会委员、

江苏省丝绸协会顾问、中国科协《中国科技专家传略》编委、《蚕业科学》主编等。1963年3月14日，他参加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，受到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、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。1980年3月23日，他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，受到邓小平、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。

数十年里，高一陵除了为我国蚕业科研成果的推广和普及，为增进世界各蚕丝生产国与我国的联系和友谊作出了重要贡献外，在开展蚕业学术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。他先后参与主编了《中国桑树栽培学》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农业卷》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蚕业卷》等；编写了《现代蚕业经营》等著作；发表有关蚕业现代化技术及蚕业经济研究论文30余篇。他参与的“中国粮食和经济作物发展综合研究”成果198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；“纸板方格簇制造机具及加工工艺”成果1983年获农牧渔业部技术改进二等奖；“方格簇的改进及自然上簇法”成果1985年获农牧渔业部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；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蚕业卷》1997年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。

1983年4月，高一陵离休后在南京家中休养，但他仍然担任第三届中国蚕学会副理事长及中国农业学会荣誉理事，为发展我国蚕业事业贡献智慧。他仍然继续关心着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的人才建设、学科建设、研究方向等。

2004年12月9日，高一陵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南京逝世，享年85岁。

